

大转折的 瞬间

——目击中国农村改革

李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大转折的瞬间

——目击中国农村改革

李锦 著



20002646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李锦 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5

ISBN 7-5438-2301-2

I.大… II.李… III.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1978~1999 IV.F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632 号

责任编辑:李思远

特约编辑:杨春丽

装帧设计:廖 铁

大 转 折 的 瞬 间

——目击中国农村改革

李锦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诚成(湖南)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0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5

字数:378,000 印数:1-6,000

ISBN7-5438-2301-2

K·404 定价:24.00 元



1982年12月31日下午3点，邓小平在北京听取本书作者李锦汇报农村改革初期情况时说“你有发言权”。

序

范敬宜

李锦同志是农村改革20多年来始终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且有研究。这本即将出版的《大转折的瞬间》，是用新闻事实来写农村改革的“史记”。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向我们展示农村改革的完整过程，充分肯定农民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图文并茂、事理结合，是本有新意有特色的农村改革专著。

农村改革开始时，我尚在《辽宁日报》当农村部主任，跑基层较多。曾经亲眼目睹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也遭遇改革初期落实政策的艰难，改革实践有着史诗般的壮美，演出过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话剧，生于其时是新闻记者的幸运。我也写过一些报道，为之作过“鼓与呼”，可后来因为工作频繁调动，事务缠身，写稿不多，实是遗憾。李锦同志长期在家庭联产承包首创之地的黄淮海平原一带农村采访，积累第一手材料甚多，现在，他以亲身经历写出此书，我欣然同意为之作序。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贯串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大问题，这是中国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和运作方式，主要是农民的意志、动向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预测未来社会的演变趋向，都不能离开农民这个“根”。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大政治家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们相继对农民问题作出过精辟的分析，提出适合中国农村特征的革命道路。邓小平领导的现代社会变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取得成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鼓舞着全国人民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道路。

农村改革是在探索中逐步明朗的，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

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这当然也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作者作为农村改革过程的参与者，以历史演变与时代更迭的眼光，立足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以1978年至1984年间发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酝酿、产生、发展与完善过程作为主线，同时兼及购销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业产业化与基层党建等重大主题，生动地展示前20年间每一重大举措的起因与发展过程，着力剖析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这些重大问题是怎么提出的？中间遇到什么阻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对于探索过程，作者有翔实而生动的记录。在表述这些事件时，作者强调的重要观点有：一、农村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时期替代另一个时期的转折点；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农民革命，是一场亿万农民再次争取主人地位的群众运动；三、实质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冲击，重点是打破一套“左”的机制、体制和制度的束缚，进行制度创新；四、农民自始至终是这场改革的主力军，所有重大创举都是由农民提出与完成的。我同意作者的基本判断，并认为这些从实践中形成的理性归纳是有意义的。

9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李锦同志数次到报社来。因为我后来下去较少，很愿意了解来自基层的情况。他一次介绍了鲁西兴福镇混合经济所有制情况，一次介绍了胜利油田资本经营情况。这些都是当时理论战线探索的新课题，而他因为在这些村庄或企业住的时间较长，了解情况多，言之有物，讲得有主见，也有激情。他不仅文字与图片报道搞得较好，还发表了不少哲学、社科、新闻与摄影论文，他的经济学理论文章还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有思想，报道有深度。而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就是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理论学习中来。这也是我读这部书稿后想强调的话。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与基本工作方法。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同样地，

调查也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根本途径。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新闻记者如果不做调查研究，不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就不易抓住矛盾的症结，从而不能形成正确的结论。只有真正走下去，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到流水中去才能抓到鲜活的鱼，抓到大鱼。从《大转折的瞬间》看，那些重要的新问题、新思想与新线索都是在第一线发现的。鲁西北商河县白集村农民走进流通渠道的报道，是我国农村改革中较早地揭示市场取向的报道，曾受到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赞扬，便是作者在骑自行车采访时从群众口中得知线索、在炕头上写出的。也正因为此，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底了解李锦同志去过200多个村庄的事实后说：“那你有发言权呐！”（见《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从1978年以来，作者每年有200多天在农村采访。在沂蒙山区九间棚调查时在村中住了52天，在兴福镇调查时住了48天。后来这些典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作出了贡献。涉深水者得蛟龙，他的实践再次证实了成功者的这条重要规律。

再一个问题是理论思维问题。《大转折的瞬间》史中有论，论中有史，不少篇章可以当论文来读：“爆发”一章，2万多字，每节都是通过照片带故事，进而阐述重要理论观点；“万元户的发现”说的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典型的寻找与发现过程，叙述了围绕按劳分配原则的斗争和记者的理性思考，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集体组”与“单干组”对阵的故事，引出对“家庭”两个字的分析，讲了8条，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迅速推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实是说理透彻的论文。从这本书所达到的理论深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新闻记者的认识水平，还可以看出新闻记者的思维流程，了解新闻记者是怎样学习与运用理论的。

我认为，新闻记者是理性的探索者，不是被动的报道者，研究改革也是新闻记者的任务。研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丰富多样的经济形式，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同时又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作出概括，才能舍去非本质的、暂时的现象，确认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才能逐步形成和发展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从而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确定与报道新闻事实。当然，进行抽象和概括，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底气足、眼界高，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功底与一定的研究能力。大家知道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同样地，在新闻的山峰上攀登，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经常征服重大主题峰巅的，往往是那些不遗余力地在理论政策的研究上下功夫的记者。

在推荐这本书时，我不能不讲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即学识修养问题。只有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具备丰富的知识修养，才可能把自己造就成在新闻领域纵横自如的大家。这本书初看以图片抓住人，细看以情节吸引人，深看以见解说服人，形成图片与文字结合、事实与理论结合的特色。一位摄影记者的图片能够相对完整地描述出深刻而伟大的农村变革，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这本由摄影记者出身的人写的改革史书，能拿出那么多照片，且不乏上乘之作，这在我国新闻界是为数不多的。从书中介绍的拍摄过程知道，他想了很多东西，有时想得很深。例如“为财神爷上供”，贴满一墙的画像，表明转折时期农民思想的混乱和迷惘，烙有鲜明的历史印记。“穷得连凳子也没有”、“上工一条线”、“‘金镶边’的大寨田”、“一个倒塌的村部”、“抓阄”、“全家人上阵”、“我们都是队长”……仅仅这些农村改革初期的照片，就使得这本书的分量变得重起来。我们在近些年尤其倡导能文能图，文字与摄影两者相辅相成，也提倡搞新闻的同志能学好理论并争取有所建树，如此，我们报道的现实与历史作用就可能发挥得更充分，影响力也会更强。办一张报如此，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亦如此。很多人已开始追求这个目标，李锦同志的成长经历及这本书可称为成功的范例。他告诉我们，文字与摄影、新闻事业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的年轻同志作这样的努力。

纪录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也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历史。正是20年前这场大变革，造就一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肯于思考与探索的新闻记者，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新闻风格与做派。这也是新闻界自身的财富，应当珍惜，并予总结。李锦是这批有作为的记者中较为年轻的

一位，可贵的是后来的20年能一直在农村基层坚持调查研究，成果甚多，积累也甚丰。现在，他拿出的这本书能够学会用政治家的眼光观察，学者的头脑来思考，史学家的立足点来回顾，用新闻文字与照片来表达，有不少独到见解。这为新闻工作者如何认真总结新闻实践的新鲜经验，如何通过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中国农村改革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继续解决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但愿更多的新闻同行，把握历史机遇，积极投身改革，作深入的调查与思考，做出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记录，写好新时代的“史记”。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现任
全国人大常委、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

目 录

■ 绪 言	1
■ 第一章 曲 折	
	
1 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8
2 灾难从吃食堂开始	14
3 农民对华国锋的企盼与失望	22
4 学大寨与山东大会战	29
5 走下飞机看东平	34
6 目击贫穷(上)	38
7 目击贫穷(下)	46
■ 第二章 地 火 (1979)	
	
1 星火在小岗点燃	54
2 与小岗同时的马坊	60
3 悲壮的转折	64
4 张浩来信与倒春寒	68
5 听民谣 辨主流	74
6 新《六十条》是前进还是倒退	78
7 两个层面 两种声音	83
8 生死搏斗	88
9 万鸭齐鸣渔家欢	93

第三章 冲突 (1980上)



- 1 又是一年倒春寒 100
- 2 焦点在东明 105
- 3 准备被撤职的书记 110
- 4 四个阶段 走了四年 115
- 5 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121
- 6 我走我的“独木桥” 126

第四章 爆发 (1980下)



- 1 飞机运票子来了! 130
- 2 万元户的发现 136
- 3 集体组与单干组对阵 141
- 4 翻身了! 解放了! 147
- 5 他为何起名叫沙到家 154
- 6 城里人多喊“糟得很” 158
- 7 我的四次冲锋 162
- 8 十三封来信的质问 168

第五章 高潮 (1981)



- 1 不买被骂 买更被骂 174
- 2 舆论界的“解冻” 179
- 3 冒尖户王本跃和他的书记朋友 183
- 4 棉花县长散传单 189
- 5 八旬棉农中“状元” 194
- 6 头版头条大照片 199
- 7 站在高地上大声发问 205

第六章 纵 深(1982)



- 1 为姓“社”姓“资”争论画上句号..... 210
- 2 新春佳节夸支部..... 215
- 3 闯商品经济“禁区”..... 219
- 4 与官商对阵..... 222
- 5 胡耀邦认为问题值得思考..... 227
- 6 邓小平对我说“你有发言权”..... 231

第七章 辉 煌(1983—1984)



- 1 农民造城的成功..... 238
- 2 五个“一号文件”..... 244
- 3 俺为啥要订143种报刊..... 247
- 4 “富农”入党..... 251
- 5 能人掌权..... 254
- 6 牟平农民春节大游行..... 257
- 7 农村改革何以成功(上)..... 262
- 8 农村改革何以成功(下)..... 265

第八章 徘徊(1985—1989)



- 1 在大别山发现“初级阶段”..... 272
- 2 蚕农的愤怒..... 278
- 3 蚕农的欢呼..... 284
- 4 从蒜苔事件到诸城合唱..... 287
- 5 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之争..... 294
- 6 农民要吃“定心丸”..... 299

■ 第九章 推 进(1990—1999)



- 1 基层党组织能否撑得住 304
- 2 山沟里也有风波 309
- 3 关键在于凝聚力 316
- 4 九间棚轰动全国 320
- 5 到“白区”探险 325
- 6 不该发生的争吵 330
- 7 政府管什么 334
- 8 “兴福现象”对所有制的冲击 338
- 9 江泽民宣布：三十年不变 340

■ 后 记348

绪 言

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农民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农民就会揭竿而起，社会不宁，江山难固。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农民被认为是“历史的弃儿”。然而，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两千年历史、20世纪的百年史是这样，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间仍然会是这样。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这个世纪，中国出现了三次伟大的转折。第一次，孙中山在本世纪初打着“民族、民生、民权”的旗帜，动员人民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第二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农民争取过来，结束了蒋介石集团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第三次，是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从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转折。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第二次革命。改革从农村开始。”在这三次伟大转折中，孙中山使中国醒过来，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使中国开始富起来。

对于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七八十年的历史中取得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验，也有着极为沉痛的教训。

以搞乡村建设运动而闻名的梁漱溟先生，曾提醒毛泽东切莫在执政后忘了农民，乃至情绪化地认为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毛泽东反唇相问：难道你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

的确，领导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且有深刻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利用蒋介石集团欺压和剥削农民而使农民吃不饱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把千千万万农民团结和组织在自己周围，将西方人认为的“弃儿”视为革命主力军，领导他们夺取政权。正如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评价的：“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这里，农民再次作为主要动力推

动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①被中国共产党人赶到海岛上去的蒋介石，到台湾后“闭门思过”，总结失败的教训，就是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有一支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这正是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蒋介石的阶级本性决定着他即使看到这一现象，也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巨大意义，这正是其局限之所在。

然而，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和处理农民问题上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依靠属于传统力量的农民的支持，特别是随着天下由乱到治，人口激增，工业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翻身解放的亿万农民走出传统的窠臼，奔向富裕文明的现代社会，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新的组织方式，再次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其主动作用。

100多年前，无产阶级革命的奠基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写下了异常深刻的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失误了。建国后，毛泽东曾考虑到当时生产力极为落后，以及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发展经济的客观实际，废除土地剥削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3年的土地改革，使农村经济面貌得到初步改观。接着，又选择了将亿万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的集体化之路，就像组织战役一样，用短短几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1958年，尚处在“一穷二白”阶段的中国，凭借革命的理想和热情，组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村经济严重破坏，物质财富极为贫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产党建立政权后曾经消灭的“吃不饱饭”现象又在农村出现了，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然而，在短暂的经济恢复后，毛泽东仍然坚持在生产关系上不停顿地调整，似乎他最擅长的是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新见迭出，从没有保守过。然而他面对的是在整体上仍以手工劳

^①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181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动为主的生产力，家庭是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他的种种调整与生产力实际状况严重不适应。政治上剥夺农民的民主权利，经济上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反复批判。对“左”的一套，农民深恶痛绝，他们反抗的办法是消极怠工，“干部打破钟，社员不出工”。这种全国性的怠工，使得集体化的优越性很难发挥，人民公社体制演变为僵死的形式，丧失了活力，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

于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又一次农民革命爆发了，爆发的核心地带便是陈胜、吴广、刘邦、张角、李密、黄巢、宋江、朱元璋等发动起义的黄淮海大平原。这场革命实际上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场冲击，方法近似历史上的“秘密结社”，也遇到有些人的反对与抵制。然而，开明而睿智的邓小平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立场与战略策略出发，支持和引导了这场农民革命。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从农民吃饭问题入手，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使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以冲天的热情把力量投入到土地上，对濒于僵死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义无反顾的冲击，其聪明才智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最终创造出符合广大农民意愿，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解决了20多年争来吵去，党内为此发生过多次严重斗争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在黄河岸边看到土改时曾舞过龙灯的一帮老汉在推行“包产到户”的第一年再次舞起长龙，高喊“翻身了，解放了”，心潮难平，深知邓小平已经赢得了农民的理解与支持。

当然，邓小平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没有丢弃社会主义原则。他保护所有制的公有形式与实质，所做的是以新的管理体制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以物质利益为驱动力，使家庭这个细胞活跃起来，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产出率，更快地增加物质财富；他同时把这场改革引向城市和所有经济领域，使整个中国势不可挡地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直在盼望社会主义垮台么？邓小平正是把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法宝也掌握到手中，在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前提下运用和掌握市场机制，使得社会主义在徘徊和动荡中又前进了。可以说，农村改革不仅挽救了农业，而

且挽救了中国，挽救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任何时代的变革，都会有两种不同声音，反映两种不同的认识与斗争。在农村改革初期乃至整个过程，一种声音是维护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批判和抵制各种有可能玷污理想的做法；另一种声音是要脚踏实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必须突破某些教条的限制。然而一个民族，既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因恪守教条而长期处在贫困落后之中。农村改革是为了摆脱贫穷，势必要改变那空洞的理想，矛头直接指向平均主义等假社会主义。当然，这场改革涉及到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观念、思想，于是，卷入农村“包产到户”论争的不仅是农村干部，而且是全中国的干部，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人。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往往是以正统的社会主义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有一部分人便是以捍卫中国古代儒家“轻利重义”道规面目出现的，似乎更加正统。他们为维护自己的道规形象而不惜放弃民族发展道路的追求，不少人并不了解农村改革的实际情况，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而大发议论。因此，这场改革不仅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思想观念，也是对中国两千年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也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思想解放运动。尽管这场农村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由来已久的重大思想与理论分歧，但它毕竟没有为那些陈腐的思想所羁绊，而是冲破障碍胜利前行了。实践打开思想解放的闸门，思想解放孕育着进步，农村改革的进步催生着新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农村改革正是催生邓小平理论的摇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许多重要论述正是以农村改革为依据而作出的。例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便是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初步找到答案的。

中国农村改革在思想解放中实现了历史大转折。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近乎180度的大弯，人们的思想也来了个大转折。正因为转弯来得急切，潮头迅猛，形成中国社会变革史上的“壶口”与“三峡”，大潮汹涌，跌宕起伏，气势磅礴，声震天地，浓缩了天下的雄壮与奇伟，形成20世纪人类发展史的奇丽篇章。

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群众、各级